

周景良 王貴忱 孟繁之 王大文 編著

可居室藏周叔毀致周一良函

附周珏良致周一良函

SPM
南方出版社
廣東人民出版社
廣州

周景良 王貴忱 孟繁之 王大文 編著

可居室藏周叔弢致周一良函

附周珏良致周一良函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可居室藏周叔弢致周一良函附周珏良致周一良函 / 周景良, 王貴忱, 孟繁之, 王大文編著.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218-13186-3

I . 可… II . 周… 王… 孟… 王… III . 書信集—中國—當代 IV . ① I267.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8) 第 215086 號

KEJUSHI CANG ZHOU SHUTAO ZHI ZHOUYILIANG HAN FU ZHOUYILIANG ZHI ZHOUYILIANG HAN

可居室藏周叔弢致周一良函附周珏良致周一良函

周景良 王貴忱 孟繁之 王大文 編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風華

責任編輯: 張賢明

裝幀設計: 瀚文工作室

封底篆印: 鞠稚儒

責任技編: 周傑 易志華 吳彥斌

出版發行: 廣東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廣州市大沙頭四馬路 10 號 (郵政編碼: 510102)

電 話: (020) 83798714 (總編室)

傳 真: (020) 83780199

網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廣州市浩誠印刷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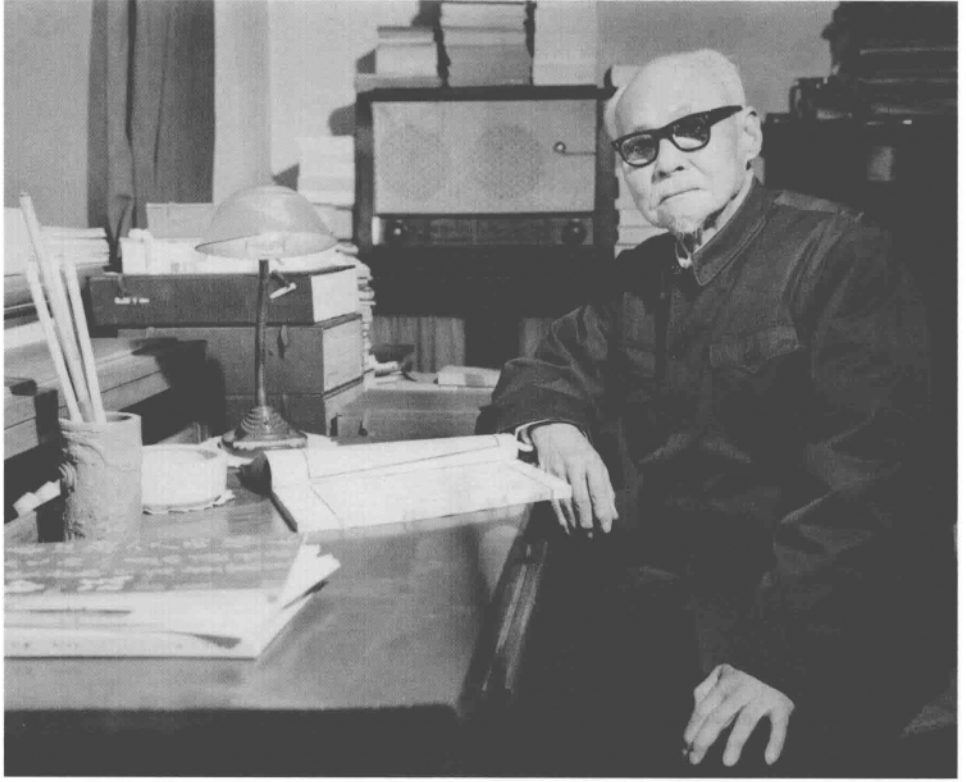
開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張: 20.25 字 數: 29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198.00 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出版社 (020-83795749) 聯繫調換。



周叔弢先生像

序 一

貴忱先生以所藏先父毀翁遺札三十九通、先兄珏良遺札十八通並景良所藏先父毀翁遺札四通、姪啟銳處藏先父毀翁遺札二通，交付廣東人民出版社印行，誠善舉也。寫信時代人際交通不便，聯繫多賴書信，故此編數量雖不多，亦足以觀當年先父生活思想及父子往來之大概。當時雖然重視政治理論學習，然以先父近九十高齡，主事者未必要求有多。而函中先父一再探討理論、辨析疑義，足見學習時自覺深思而不應付。篤實修身，出於自然也。展讀信札，當年情景宛在眼前。彼時生活節奏緊張，極少私人閒暇，為人子者，省親不能以時，饋養不能盡意，每念及此，慚愧感慨之情，不覺發乎內心。

貴忱先生示下此編，因識數語以呈。

周景良

二〇一七年八月一日

序二

周叔弢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古籍版本學家、藏書家。一九五三年，余北上省親之際，有幸得與周先生邂逅於津門天祥商場書肆，獲蒙指點版本之學。憶此六十多年前舊事，至今念念不忘。丁酉因言獲咎後，未敢與先生通候，直至七十年代後期，才有機會向先生請安。先生性謙和敦厚，晚年多有貽書，誘學不絕，貴忱獲益尤多。因與周叔弢先生往來，得識其嗣子周一良先生。一良先生是一位治學嚴謹、為人謙和的史學大家。他長余十五歲，每每關愛備至，言傳身教，貴忱之幸也。

一良先生曾將父親周叔弢先生寫與他的若干信箋投贈，囑余有機會發表出來。此事不佞念茲在茲，沒齒難忘。余與周叔弢先生幼子景良先生過從甚密，二人合議，由孟繁之先生整理注釋，商請廣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善哉，泰初師之願圓矣。

王貴忱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日

目錄

周叔弢致周一良函

說明	三
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九日	四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一〇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六日	一四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六日	二〇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二四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二八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九日	三二
一九七六年二月九日	三八
一九七六年六月五日	四二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四八
一九七六年六月三十日	五二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日	五六
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日（周景良藏）	六〇

一九七六年八月九日（周景良藏）	六四
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周啟銳藏）	六八
一九七七年八月五日	七二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日	七八
一九七八年六月七日	八四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八八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八日	九四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七日	一〇〇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日	一〇六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一一〇
一九八〇年十月八日	一一四
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五日	一一八
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一二二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一二八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一三二
一九八一年三月三十日	一三八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一四二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四日	一四六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一五〇
一九八一年九月後（周啟銳藏）	一六〇
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	一六二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一六六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	一七二
一九八二年八月六日	一七八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一八六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七日	一八八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一九四
一九八三年九月九日	二〇〇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四日（周景良藏）	二〇四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日（周景良藏）	二〇六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二〇八
一九八三年×月二十七日	二一二

附周珏良致周一良函……………二一七

說明……………二一九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一日……………二二二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二日	二二八
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日	二三四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二日	二三八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二四二
一九八〇年六月九日	二五〇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日	二五六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日	二六二
一九八一年四月七日	二六八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三日	二七二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一日	二七八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六日	二八二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二八八
一九八一年十月八日	二九四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二九六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日	三〇二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三〇八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二日	三一〇

周叔弢致周一良函



說明

可居室者，嶺南王貴忱先生之齋號也。王貴老處藏有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周叔弢先生致周一良先生函三十九通、周珏良先生致周一良先生函十八通，皆係太初先生健在日所親贈者。壬辰以還，余協助周景良先生整理弢翁日記、遺札（國家圖書館出版社規劃項目），徧蒐各方，計得弢翁札約七百通。微弢翁致一良先生、父子通函，總景良先生并啟銳先生處，僅得六通。以七十餘年父子，寥寥此數，每引為憾事。乙未歲杪，沈津先生北來，得林小安先生之介，與余及景良先生把晤。席次，談及近年所整理之弢翁日記、遺札、題跋，弢翁所藏酒票，及所發見之顧起潛先生致弢翁函、起潛先生一九三〇年代為弢翁過錄諸家題跋之徐子晉《前塵夢影錄》。沈先生語嘗於廣州王貴老處得見弢翁致一良先生函數十通。此乃景良先生、啟銳先生及區區所不知者也。丙申新正，徐蜀先生攜向日自王貴老處所拍攝之弢翁致一良先生、珏良先生致一良先生父子兄弟通函圖版前來，呈景老與余，并屬余代為董理、編次，希望付之剞劂，借出版機構之力，以廣流播。總弢翁致一良先生函，合三家之藏，凡四十五通。雪泥鴻爪，從一個個側面反映出弢翁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至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四日逝世前數月三十餘年間之大致生活情略。函札內容，或父子談書論學，或述及社會近聞、家事，或敘以近況，或記一代掌故，間及國家大事，非僅一代文化史料，亦一代社會史料、生活史料矣。二十世紀後半葉正值中國社會空前急劇變化之時，弢翁以花甲、古稀之年置身其間，由其獨特經歷、視角折射出之人世世相，對於後人了解及研究此段社會文化史乃至中國現代史，均具有無可替代之參考價值。爰總三家之藏，編次、箋注如下，以饗讀者。標題仍以「可居室藏」，非徒以卷帙多寡，且記周氏父子二代與可居室主人之不世因緣矣。原札中之誤字、增補字、衍字，分以（）〔〕〈〉標出，「相形而不相掩」，存其真而求其實也。丙申仲春，孟繁之記於燕東園。

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九日

一良閱：

我九號赴唐山，十三號向全體職工交待，低頭認罪。因為坦白比較澈（徹）底，態度誠懇，職工允許過關，并建議政府從寬處理。從此我從鬼變成成人矣。〔一〕北京圖書館「三反」不知結束否？趙萬里不知問題嚴重否？我現決定將全部藏書（善本與普通本、外文書籍）捐獻政府，擬指定交北京圖也。〔二〕爾尚有書箱在此，我的書中爾如有留者，望早決定為要。

父字

五月十九日

〔一〕 弢翁《日記摘鈔（一九五二—一九六二）》一九五二年五月記：「五月九日，到唐山。市長閻達開，政委李力果，副市長朱康，啟新軍代表趙光。五月十三日，在啟新工廠群眾大會上交代（「五反」運動），從鬼變人。五月十四日，在李政委處午飯。三月餘以來，第一次暢飲。有人告訴我，我過關是中央指示。」「衣冠整齊，保護過關」。五月十五日，回津。（五月十七日政府接管開灤。徐達本任主任。）」（弢翁《日記摘鈔（一九五二—一九六二）》原件，現藏周景良先生處）

〔二〕 弢翁《日記摘鈔（一九五二—一九六二）》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九日：「鄭西諦（案鄭振鐸）來談捐書事。趙斐雲（案趙萬里先生）以為是意外大事。」八月三十一日：「張蕙玉、趙萬里、高希曾來取藏書。」周景良先生處藏弢翁一記事本之中「獻書」條云：「一九五二·八·二九。（點收）（信件）。重要善本書籍七一五種，二六七二冊。張珩、趙萬里。」此前一年，弢翁曾將所藏《永樂大典》一冊捐獻北京圖書館。弢翁於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日致函北京圖書館云：「敬啟者：頃閱報載，貴館展覽《永樂大典》，內列十一冊為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東方學系圖書館所移贈，此種真摯友好及偉大國際主義精神具體表現，實從古未有之盛事，傳播書林，永留佳話。僕舊藏《永樂大典》一冊（杭字韻卷七六〇二至七六〇三），謹願捐獻貴館。不敢妄希附偉大友邦之驥尾，以傳珠還合浦，化私為公，此亦中國人民應盡之天責也。專此。敬上 國立北京圖書館。周叔弢啟，一九五一年八月廿日，天津桂林路二十號。」此次之後，弢翁對北圖續有捐贈，其中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六日第二次捐獻，善本古籍三二種，一二〇冊。

另，周紹良先生《周叔弢傳略》：「老人搜藏善本書籍，并不只是為個人玩賞，或借以沽名釣譽，標榜自高，他的思想第一（下轉六頁）」

一區閱我九号赴唐山十三号向全体
 職工交待体察情况固者坦白比較激
 底態度誠懇職工允許過向并建議
 以府层定處理此信鬼字成人矣
 北京圖書破三反不知結束否趙万里
 不知向趙嚴重否我現決定將全
 部藏書捐^(善本與普通書知本交魏)政府擬指定北京國
 也尔有女箱在此我的中^字有寫者
 生早決它為要

父字

五月十九日

(上接四頁)是要使這些珍貴文物不致散失,更不要流至海外;其次是怕不懂得書籍的人弄去會使書籍遭到損害,甚至糟蹋毀滅。所以遇到好書,總是設法留下。他總想能使他收集到的善本書籍有朝一日在統一的國家之下歸於一個保護書籍最好的圖書館,使一生心血不至白費。所以在解放之前,他曾把藏書編成目錄,他的藏書都見於這本書目。他在書目前面寫了一篇小序,其中說,「此編固不足與海內藏家相抗衡,然數十年精力所聚,實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孫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內無事,應舉贈國立圖書館,公之世人,是為善繼吾志。倘困於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則取平值可也。勿售之私家,致作雲煙之散,庶不負此書耳!」(案此為張翁一九四二年手訂所藏善本書目,於卷首所作題記,亦為預留遺囑矣。)全國解放,老人多年盼望的全國統一的日期到來。一九五二年,他在北京遇到當時擔任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氏,告訴他決定把藏書中最精品捐獻給北京圖書館,鄭氏大喜過望,在書到北京後,寫信給他說:「(張)蕙玉、(趙)斐雲回京,將來先生捐獻之善本書目,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北京圖書館增加了這末重要的一批「寶藏」,不僅現在的「中國印刷發展史展覽」大為生色,即將來刊印「善本書目續編」時,亦足令內容充實、豐富,大為動人也。敬(謹)代人民向先生致極懇摯謝意!至於將來學者們如何在這個「寶藏」裡汲取資料,則尤在意中;化私為公,造福後人,先生之嘉惠,尤為重要也。」後來老人到北京參觀中國印本書籍展覽(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北京舉行)時,鄭振鐸對他說:「你是把珍秘之書全部獻出,并未保留一部,真是難得難得!」當有人問到老人怎樣能如此堅決而不留幾本自己玩呢?他笑著說:「捐書的決心并不是輕易下定的。祖國走上了繁榮富強的道路,我要履行自己的諾言,要親手把書獻給國家。這些書我都心愛,全部獻出為好,不然會藕斷絲連啊!」老人把所藏最精的宋、元、明刊本及一些名鈔本、精校本總計八百多部,全部捐給了北京圖書館,接著又在一九五四年把一些書籍分捐給天津人民圖書館和南開大學圖書館,這些大部分都是叢書和清代刻本精印書,而今天也是不易得的。一九七三年又把最後剩下的書籍數千冊捐給天津人民圖書館,包括他為研究清代板刻史而專門收集的清代銅、泥、木活字本書籍七百多種,使這一極冷僻而難搜尋的研究資料也歸於國家保存,滿足了他七十多年收書的一貫心願。」(《晉陽學刊》一九八五年第一期,六八至六九頁)

周珏良先生《我父親和書》亦云:「我父親和書的關係我想可以歸為三句話:苦心收書,一心愛書,熱心獻書。他收書之苦心可以用他九十歲那年(一九八〇年)為他一九四二年手訂的善本書目所寫的題識上的一句話表達:「此目寫於三十年前,一生精力聚於斯。」這話初看上去似乎是泛泛而談,但是其中甘苦卻有許多難為不知者道的。在抗日戰爭前他經營工廠,收入是不不少的,但是善本書價錢之高也使他常常要費力才能得到。宋元本書一部動輒要幾百上千乃至幾千元。他在一九三三年買宋刻湯漢注的《陶靖節先生詩注》兩本書就用了四千元,是負了債買的。在抗日戰爭前夕,他經營的工廠都被日帝國主義者強吞以去,收入大為減少。一九三六年丙子元宵節時,他在自己記載所買古書文物的冊子上寫道:「負債巨萬尚有力收書邪?姑立此簿,已運往昔半月之期矣。」到了那年除夕他又記道:「今年財力不足以收書,然仍費五千七百餘元,結習之深,真不易解除也。所收書中亦自有可喜者,但給值稍昂耳。」全面抗日戰爭開始後,他於

一九三九年己卯歲末又寫道：「今年本無力收書，乃春初遇陸鑒（指金代張氏晦明軒刊本《通鑿節要》）、毛詩（指宋監本《毛詩》），歲暮遇《衍約說》（宋本）、《蛻庵集》（指陸其清手抄，王聞遠、黃堯圃校跋本），不得不售股票收之，孰得孰失，正不易言耳。」一九四二年壬午他因家用不足，忍痛割愛，賣出明本書一百數十種，得了一萬多元。這時有北平的書商從上海買到宋余仁仲萬卷堂刻本《禮記》，帶到天津給他看，他見這書刻工印刷都十分精美，毅然以一萬元高價買了下來，在書後跋語中說：「昔人割莊易《漢書》之舉，或尚不足以方余癡。而支硎山人「錢物可得，書不可得，雖費當弗較」之言，實可謂先獲我心。」在同年歲暮，又在購書冊中記道：「賣書買書，其情可憫，幸《禮記》為我所得，差堪自慰。衣食不足，非所計及矣。」從以上這幾件事中很可看出他收書的苦心。」（《文獻》一九八四年第三期，一六一至一七五頁）